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

十大戏曲家



章培恒主编 • 上海古籍出版社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大戏曲家



章培恒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沪新登字 109 号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大戏曲家

章培恒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5 字数 115,000

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8,001 23,000

ISBN 7-5325-0865-X

I·480 定价: 2.75 元

前 言

早在公元前好几百年，希腊就有了戏剧。比较起来，中国戏剧的形成却要晚得多。尽管有几位研究者正在努力证明中国很早就有戏剧演出，但目前似尚未成为定论。较为稳妥的看法，是把宋代作为我国戏剧开始形成的时期。至于有剧本传留下来，则始于元代。

宋、元时期，我国已经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城市居民。宋代戏剧的形成，跟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需求有关。到了元代，由于汉族的读书人社会地位较低，加以长期不举行科举考试，他们在仕途上很难得到进身的机会；这就使其中数量不少的一批人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都跟市民接近。

元代的好多戏剧就是由这批人创作的。在关汉卿——元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——的散曲《南吕一枝花·不伏老》中有这样的自白：

……半生来折柳攀花，一世里眠花卧柳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，盖世界浪子班头。

这种生活态度在元代剧作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。可以说，很多剧作家都跟我国直到宋代为止的正经读书人有颇大的差别。从这一点说，我国戏剧形成得晚，倒是给它带来了一些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、值得重视的特点。

大抵说来，我国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倾向。中唐以后，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强；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道德精神就成为一种有力的传统。如同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的，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；对政治性和道德的强调，在当时也就使文学的封建意识更为浓厚。而戏剧，由于一方面跟城市居民的要求相联系，而城市居民看戏是为了娱乐，另一方面剧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又是如此，剧本中对政治性和道德的强调也就较少，而对娱乐性和抒情性则相当重视。所谓抒情性，不但是抒发剧中人的思想感情，使人物更具有感染力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抒发剧作家的思想感情，使之与剧中人的思想感情水乳交融，从而使作品更为感人。

当然，这些剧作家的思想并不是与封建意识绝缘的，因而在作品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封建观念，但比较起来，他们所受的影响较少，因而作品能较多地表现当时城市居民的观点和感情；他们对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，他们的欢乐和苦难，他们的希望和追求。元代戏剧之所以能出现《墙头马上》、《西厢记》这样讴歌恋爱自由和《窦娥冤》这样抒写下层人民痛苦的作品，这恐怕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

到了明代，情况曾有所变化。从明初起，思想统制加强了，而且地位较高的人——甚至封为藩王的人——参加到戏剧创作中去的也增多了，戏剧创作方面一度失去了原有的那种精神。但从明代中叶起，随着城市经济的复苏和发展，市民力量的逐步加强，在意识形态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注重个性和人的欲求的潮流。作为这种潮流的反映，戏剧界出现了李开先、徐渭、汤显祖等剧作家；汤显祖创作的《牡丹亭》更是我国戏剧的瑰宝之一。明末清初，这种潮流逐渐衰退；作为它的余波的，主要是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。

本书所介绍的这十大戏剧家，就是我们认为在我国戏剧史上能够显示出上述历程的十位代表（严格说来，是十一位；但其中的王实甫实在缺乏资料，而且《西厢记》是否有一部分为关汉卿所写，

也还存在着不同说法；所以我们在介绍关汉卿时也附带介绍了王实甫）。参加写作的，大部分是较年轻的同志。限于我们的水平，错误缺点在所难免，诚恳地请求读者的指正。

章培恒

一九九〇年三月

目 录

1	前 言.....	章培恒
1	白 朴.....	彭 飞
22	关汉卿 附王实甫	马美信
48	马致远.....	马美信
63	高 明.....	邵毅平
85	李开先.....	金曾琴
102	徐 渭.....	贺圣遂
126	汤显祖.....	黄 毅
153	李 渔.....	陈正宏
171	洪 昇.....	章培恒 谈蓓丽
200	孔尚任.....	陈杏初

白 朴

在元杂剧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，在元散曲蓬勃兴盛的繁华岁月，有一位卓越的剧作家、散曲作家为那个年月足以彪炳千古的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，他就是本文要介绍的白朴。白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杂剧与散曲的全才。明何良俊称马东篱(致远)、郑德辉(光祖)、关汉卿与白仁甫(朴)为元曲“四大家”。“关、马、郑、白”从此名扬天下，昭垂后世。明王世贞在《曲藻》序中称白朴与同时代的王实甫、关汉卿一样，“富有才情，兼善声律，以故遂擅一代之长”。近代学者王国维也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中赞颂白朴“高华雄浑、情深文明”，“不失为第一流”。白朴一生作杂剧十六种，

今存二种，又有二种残文传世，余皆佚失。白朴的散曲尚存小令三十七首，套数四套。另有《天籁集》词集二卷。这样一位创作甚丰、才学兼备、风格清新、特色昭著的大文学家，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，又在怎样的时代氛围里，为后世留下了如此宝贵的文学财富呢？

—

白朴，初名恒，字仁甫，后改字太素，号兰谷。祖籍山西隰州（宋代属火山军，元代属保德州，明清至今均称河曲县），金哀宗正大三年（1226）出生于金都南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金亡后曾寓居真定（今河北正定县），故元钟嗣成在《录鬼簿》“白朴小传”中误以为他是真定人。

白朴的父亲白华，字文举，号寓斋，是金代贞祐三年进士，开始任应奉翰林文字，以后迁升枢密院经历官，枢密院判官、右司郎中等职，地位十分贵显。白氏世代为郡中望族，白朴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文学气氛的环境里。父亲以诗出名，著有《寓斋集》，伯父白賁为词赋科进士，作有诗集《茅亭诗》。叔父宝莹是个诗僧。当时文坛名士如赵秉文、李冶、刘祁、吴澄、杨果，都与白氏昆仲有交往；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更是白华

的至交。王博文为《天籁集》所写的序言中说：“元、白为中州世契，两家子弟，每举长庆故事，以诗文相往来。”把元、白两家的友谊和唐代的元稹与白居易相比。白朴虽然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家庭，却生活在一个十分动乱的时代。金哀宗天兴元年（1232），蒙古兵两度围攻开封，形势险急。岁末，白华随哀宗出奔河北，又返南岸奔归德。次年正月下旬，金守将崔立叛变，以开封降蒙古，将不少金朝大臣显要的妻女呈献给蒙古军队，白朴的生母张氏亦在被掠之列。当时，他还不到八岁，就遭到失母之哀，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。王博文在《天籁集》序中写道：“幼经丧乱，仓皇失母，便有山川满目之叹。逮亡国，恒郁郁不乐。”破城时，元好问亦在城内，因与蒙古主将张柔有亲戚关系，不但未伤毫发，还负起了抚养白华子女的责任。蒙古兵退后，白朴和其姐便随元好问于四月底离京北渡，流寓山东聊城冠氏县，约有四年光景。元好问不但抚养白朴姐弟，还亲自教导他诵读诗文。这四年期间，一度曾流行瘟疫，白朴不幸被传染，元好问守持看护，六昼夜未能安眠。直至白朴手臂脱离了危险，元好问才算放下心来。白朴聪明好学，爱提问题，有元好问教授指点，自然得益非浅，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。

白华随金主奔逃，后奉使至邓州调兵，邓州节度使降宋，白华亦随之入宋，先后在湖北均州、襄阳等地为官。金天兴三年(1234)，蒙古与宋联合灭金流亡政府于归德，北部中国为蒙古所统治。越二年，因襄阳、均州、房州一带降宋的北军又叛宋归降蒙古，白华乃得北归，去真定投靠史天泽。秋后，元好问从冠氏县去看望白华，同时将白朴姐弟送还。当时，白华十分感激，曾有诗答谢，内有“顾我真成丧家狗，赖君曾护落巢儿”之句，白朴当时十一岁。白华归降蒙古后，始终未被录用，由金代显宦、宋室郡臣变为亡国流民，托命新朝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这种历事三朝的行为，自然为当时的文人所不齿。因此，他精神负担很重，便潜心于子女的教育。白朴自归家后，生活比较安定，便得致力于文学修养。白华仍按照他的老路来培育白朴和其兄白忱，令“习进士业”。这样有十五、六年时间，白朴一直在滹沱河畔的真定闭门读书。其时，史天泽担任真定、大名、河间、济南、东平五路万户，对于金之遗贤名士，他广为结纳，妥善安排这些人的生活，并与之“讲究经史，推明治道”。白华、元好问、李治(元史误作冶)、王若虚都先后得到很好的款待。真定在元属中书省，不受战乱祸害，文化十分发达。元好问在逝世前十年间，每日来白家，必定

问及白朴的学业。《天籁集》序曾记叙这段往事云：“律赋为专门之学，而太素有能声，号后进之翘楚者。遗山每过之，必问为学次第。常赠之诗曰：‘元白通家旧，诸郎汝独贤。’未几，生长见闻，学问博览。”蒙古灭海失后元年(1248)，元世祖忽必烈尚未继位，张德辉曾带白华去王府并举荐他出仕，但此时白华身经世变，已无心禄位，即用诗《题靖节图》以明其志。诗曰：“咄哉灵运辈，竟坐衣冠辱。谁知五柳家，春雨东皋绿。”白华晚年这种向往陶渊明易代不仕的思想对白朴也深有影响，白朴在新朝终身不仕，即与此有关。

元世祖中统二年(1261)，曾命各路宣抚司官“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，及茂才异等，列名上闻，以听擢用”(见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)，当时白朴已三十六岁，身为台阁重臣、中书右丞相的史天泽对他十分看重，把他举荐给朝廷。白朴再三辞谢，坚决不肯做官。尽管史天泽地位显赫，又与白家为世交，他也敢于冒犯，于是年夏秋间弃家南游，开始了放浪山水之间、历游大江南北的生活。白朴之所以绝意仕进，主要原因仍可以从民族感情来解释。白朴生活的时代，社会动乱、民族矛盾错综激烈，金、宋、元三朝变幻迅速，白华以金之重臣而降宋，已不能算作金之遗老，白朴在金亡时年仅八、九岁，连遗老也说不上。可他们父

子对金、宋的感情，和对元朝是不同的。金是汉化已久的民族，元视之如汉人，金人也以汉人自命。所以国家兴亡的感慨，在白朴的词曲与剧曲中时有反映，再加上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消极出世风气的影响，白朴终其一生，也没有出任过元朝的一官一职。

白朴在真定伴父读书的岁月，正是元杂剧从产生向繁荣的过渡时期。自北宋开始的市民文学的高涨，使中国传统文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，在金诸宫调和院本的基础上，新型戏曲——元杂剧登上了舞台。十数年间，白朴结识了一批剧作家。原来，元杂剧前期作家除大都、平阳之外，大多数是真定一带人，其中真正属真定籍的著名剧作家就有李文蔚、尚仲贤、戴善甫、侯正卿、史九敬先等人。一些当时有名的散曲作家如胡祇遹、王恽、王博文、奥敦周卿等，也先后与白朴交游；更不要说散曲前期名家卢挚，与白朴有亲戚关系（白朴之弟白恪娶卢挚之妹为妻），两家的过从就更密切了。白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耳濡目染地开始了散曲与杂剧的创作。

从三十六岁至五十一岁这十五年间，白朴在大江南北各地飘游，他先由真定南下，羁迟九江。至元六年（1269）曾至怀州（今河南沁阳县），作客于前金旧臣、白华好友、怀孟路总管杨果之府。至

元十三年重寓九江，往来于江西、湖南各地。两年后又返九江，不久便买舟东下，于至元十五年(1278)正月到达扬州。住了二年，才最终定居金陵。当时他的弟弟白恪任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经历，江东建康道置司于金陵，兄弟又同处一地，这年白朴五十五岁。在这前一年(1279)南宋灭亡，东南兵事结束，白朴的生活更加平静，常与诸耆老会饮游眺，题咏于南唐故宫，丽华废祠，登凤凰台，访乌衣巷，抒其怀古之思。白朴一生，虽然政治上与元统治者没有瓜葛，但与他有交往的除元好问、李治可以称得上金之遗老外，其余像史天泽、杨正卿(即杨果)、张大经(御史)、师巨源(监察)、吕文焕(合道按察使、平章)、李景安(提举)、刘牧之(同知)等，都是官场人物。至于诗文中未列官衔的王仲常、郭祐之、王彦立等，并非平民，有的做过官，有的曾是大官的幕僚。上述情况表明，与白朴诗酒往还的大部分还是上层人物。他以前朝宦家和当代名士的身份，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，周旋于地方官吏之间，消闲寄生，与一般老百姓的苦难生活仍有相当的距离。

至元二十四年(1287)，行台中丞王博文为白朴《天籁集》作序。二十六年，曾至扬州送胡祗遹、王仲谋两按察赴浙西、闽中任，有《木兰花慢》词可证；二十八年游杭州西湖，作《永遇乐》词。元

成宗大德十年(1306)秋，白朴再到扬州，作《水龙吟》词，当时他已是八十一岁的迟暮老人了。从此以后，他的行年便不可考。白朴死后，因子而贵显，元朝廷赠他“嘉议大夫，太常卿，仪院太卿”(见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)。太常礼仪院是掌管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的官职，设卿一人，为正三品。这样的封谥规格在元杂剧作家中是罕见的。

纵观白朴的一生，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白朴的文学创作。他生于宦族，有家学渊源，如果不是战乱与金国的覆亡，他很可能仕途通达，高官厚禄，顺当地了此一生。可是，动乱的岁月堵塞了仕途，幼年失母打击又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，成年之后其父亲业已隐居遁世，这些都促使他绝意仕进，放浪形骸，纵情诗酒，玩世滑稽，闲适处世。元好问金亡不仕、专心著述对白朴影响甚深，这是因为患难中的照顾、学业上的教诲，在他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特殊效果。中统初年他拒绝史天泽的荐举，并终生抱着与元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绝非偶然。他对金元之际的社会矛盾与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看法，因而怀古伤时，郁郁不乐。白朴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，施展抱负，而是屡屡感到自己生不逢时，便寄情于山川名胜、沉溺于诗酒声色之中。他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确有

不满，但又没有决心跳出土大夫隐逸闲适的生活圈子，更难以做到与平民百姓深入接触以表达他们的心声。封建社会中有作为而被迫沉沦的知识分子，往往都存在着这样的思想局限。这种精神状态，促使白朴一方面无意为统治者效力，而另一方面又不拒绝与达官贵人为伍，咏史题画，酬答往来，有时甚至还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。他既欣赏隐居生活的恬静、美好，怡然自得，又常想到国破家亡，精神上的苦闷难以排遣。这两方面又矛盾又统一，构成了白朴独特的人生哲学。孙大雅在《天籁集》序中有一段话说得比较中肯，“先生少有志于天下，已而事乃大谬。顾其先世为金世臣，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，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，于是屈己降志、玩世滑稽。徙家金陵，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，日以诗酒优游，用示雅志，以忘天下。”

二

白朴的文学素养与才能都很高，在元曲作家中相当突出，理应归入第一流作家之列。他幼年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，汴京“壬辰之难”后又幸获元遗山的悉心指导，可以说是上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文词赋方面的优良传统。青壮年时遍历名